

桂花香里的血雨腥风

——文化与传播学院桂林抗日遗址实践考察报告

吴三军 张素娥 刘吉冬 李景强 李先知

提起桂林,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如画的风景,如诗的山歌。作为一座旅游名城,桂林可以说早已深入人心。

然而,任何一座城市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桂林也不例外。记得小时候读历史书,经常听到诸如“桂系军阀”“豫湘桂大会战”等名词。带着对历史的感怀,我们文化传播学院一行五人于2014年11月初从北京出发,探访桂林。

一、八百烈士墓探访

和云桂一带其他的地貌类似,桂林城区也是一片平地上冒出一个个小山头的地貌,著名的象鼻子山便是小山头之一。每个山头,或成为公园,或成为地标,而几乎每一座山下都曾是一段历史故事的发生地。考察第一天我们要去的七星公园也正是位于这样一座山下。

从栖霞寺西行百余米,穿过一片繁茂的桂花林,便来到七星公园。和其他许多城市公园一样,每天总是有络绎不绝的市民来此晨练散步,显示着一片宁静祥和的气氛。可是谁会想到,70多年前的这里,却是一个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沙场。

时光回到1944年。

那年,抗日战场上爆发了著名的豫湘桂大会战。中、日两军在正面战场上展开你死我活的大拼杀。日军借助优势兵力,连续拿下河南、湖南。国军虽偶有抵抗,但大部在战场上溃不成军。日军的七个师团携飞机、大炮等重装备兵临桂林城下,企图一举拿下桂林。

桂林守军原来就军力不足,一开始驻守的是国民革命军第31军,下辖131师和188师,而在开战前夕,其中的188师又被调出,这使得守军力量更加捉襟见肘。后几经拼凑,但最后的力量仍然比较薄弱。

蒋介石的原意,是想弃守桂林、柳州一带以保全实力,后又决定死守桂林,以便为日后的反击赢得时间。因此,就形成了两军实力悬殊而桂林守军又不得不拼死一搏的局面。

当时日军有15万余人之众,且有飞机、大炮等重型武器。而桂军方面即使加上后续加入的民团,也不过区区2万人,火炮也只有22门(加农炮2门,山炮12门,高射炮4门,战车防御炮4门)。更有甚者,不少桂军手里拿的还是木枪。尽管如此,桂军上下依然同仇敌忾,抱定了与桂林共存亡的决心。为此,他们做好了巷战的准备,几乎把所有的房子都修成了地堡,所有的路口都加了防御工事,甚至所有的井里都下了毒。还有的事先在身上绑上了手榴弹和炸药,准备随时与日军的坦克同归于尽。

惨烈的战斗枪声终于打响了。日军以桂林城外的屏风山、猫儿山等四个据点为突破口,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桂林城发起猛攻。桂军守军两个营的700余名将士拼死战斗。然而,屏风山、猫儿山等阵地终因寡不敌众而落入敌手。攻下这道防线后,日军开始从水路包抄,派大量登陆艇进攻桂林。

资料显示,当时日军曾经27次攻入桂林市中心而又不得不撤出。可见城内守军抵抗之顽强。于是,日军又想出一计,试图从漓江迂回攻打桂林。面对险恶的敌情,桂军不惧危险,继续在水面打击敌军。甚至有不少民团敢死队队员在身上绑上炸药,划着竹排去炸日军军舰,场面可谓气壮山河。

与此同时,城内巷战也日趋白热化。

日军的战报中称:“我师团在桂林遭到了广西当地土著武装的顽强阻击,这些土著武装的装备虽差,但是极为凶悍,至死决心甚浓,其勇猛为我军远远不及,我军士气低落到极点……”日军下级军官也有过这样的记录:“自小听说之桂林景色宜人,为世之罕见,但今日我军遭到了自战争以来最凶猛的抵抗,城中到处都是枪声,到处都是地雷,全城都在肉搏,我大队900余人在战役结束后仅剩70余人,且多为伤兵,在战后从敌军死尸上发现桂林之敌军的武器竟然大多为我国40多年前已淘汰的火枪,如此简陋的武器居然令我们遭受到如此巨大的伤亡,虽为敌人,但亦为之忠勇精神而感慨。”

由此可见,桂林守军不仅打击了日军的军事力量,更是打击了其士气。

日军认为桂林之战的惨烈程度高于之前的衡阳会战是有道理的。首先,桂林守军的装备远不及衡阳守军。其次,桂军除了正规军,还有大量的地方武装,军人中除了青壮年,还有不少白发老者。另外,日军在桂林作战中还使用了毒气,桂林守军不少是在被毒气毒倒后而被俘的。

桂林保卫战,实际上是当时全民抗战的一个缩影。桂军、西北军、湘军、川军、滇军等等,不论之前有何恩仇,都在统一抗战的旗帜下站到了一起,真正展现了“国不分东西,人不分长幼”的抗日图景,体现了抗战到底的信心与决心。

在这场殊死搏斗中,最为世人所铭记的还是“八百烈士”的故事。

1944年10月29日至11月初,国民党军驻防漓江东岸。当时正逢大雨,加上友军增援受阻,城防司令临阵脱逃。日军乘虚而入,造成穿山、猫儿山、屏风山、普陀山、月牙山等阵地相继失守。同时,漓江大桥也被日军炸毁,以致城内外交通阻断。在形势

极度危险的情况下，桂军官兵加上伤员共八百余人被迫躲进普陀山七星岩内，继续抵抗。

普陀山被围后，日军先是用大炮轰击，继而向岩内喷射毒气和扔汽油弹，最终导致八百余人全体殉国。

直到抗日胜利后的1946年，八百壮士的遗骨才被收敛合葬。墓地呈长方形，正面有蒋介石的亲笔题字碑刻，上书“英风壮节蒋中正题”，以示对先烈的祭奠。

二、《桂林保卫战》影视剧研讨

或许是时间上巧合，我们一行到达的那个时间，一场关于艺术再现桂林保卫战的影视剧本（剧名《桂林保卫战》）专题研讨会正在召开。因为我们考察组成员中有不少有着影视艺术方面的专业教育背景，因此也很快参与到了“如何用影视作品表现历史”的研讨中来。

这场研讨会由桂林市文联、市文化局、市社科联、市抗战文化研究会共同举办。采访中了解到，市有关方面认为，电影文学剧本《桂林保卫战》的创作，对于揭批日寇罪恶行径、宣扬爱国主义精神、实现历史传承、以史为鉴等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据了解，该剧本的创作者是桂林老作家曾广良、马玉成。曾广良从事新闻工作多年，曾创作过大量的文学作品，写作过多部影视剧本；马玉成也曾出版多部纪实文学作品，创作过多部影视剧本。

为了更好地协助他们完善剧本，也为了尊重和纪念那段历史，考察组也就地举办了一次关于剧本的研讨会，并把大家的意见做了汇总，以期对《桂林保卫战》剧作的修改提供我们的帮助。我们提供的思路主要有：

（一）在历史的维度上，应真实还原历史

我们坚持一点的是，八年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战争。在国共二次合作这样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抗日战场是由两个分战场构成的：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场。

尽管国共双方的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等截然不同，甚至是对立的，但在中国处于生死存亡之际，为了全民大义，二者走在了一起。这两个分战场又呈现出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的关系，均为历史做出了贡献。

如何评价国民党在战争初期发挥的作用？这是一个颇具讨论价值的历史命题。过去我国史学界的主流声音，总体上对其是否定的，通常冠之以“投降”“消极”等字眼。而台湾方面则相反，多为弱化或否认共产党的作用。在我们看来，这都不是全面、辩证的唯物史观。任何的厚此薄彼，都是对历史的轻慢、对烈士的不公。

不过，以当前的主流话语倾向来看，当下更重要的是抛开长期以来的国民党抗战否定论，告诉公众一个真实的国军抗战史。这里，我们也梳理出了一些当前史学界关

于这一问题的基本共识：

第一，国民党军是抗日正面战场的绝对主力。在整个抗日时期，国民党政府组织了一系列大会战，其中包括淞沪会战、晋北忻口会战、武汉会战、台儿庄战役等等，这些战役都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的一个个重要里程碑。

第二，正面战场的牵制，使得日军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神话被打破。同时也极大地消耗了日本的军力和国力，使其陷入战争泥淖不能自拔。这也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三，支援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敌后战场的开辟，为敌后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四，国民党官兵的英勇顽强极大地鼓舞了民族士气，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从而极大地坚定了抗日必胜的信心。

第五，“唤起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扩大了中国抗战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第六，重庆迁都使得一些工业、学校迁向西南，造就了西南抗战基地，为长期抗战创造了条件。

在相持阶段，战场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日本看到强攻不下，也改变了对华策略。由此，国民党开始采取消极、观战的态度，以保存实力。同时，一些反动方针也开始形成，如“防共委员会”的设立等等。同时，八路军、新四军的活动也受到不少限制。第三次反共浪潮随之掀起。这一切，都使得抗日局势向着不利态势发展。国民党部分正面战场的溃败与此不无关系。

尽管如此，国民党总体上还是坚持了抗战，相当大程度上钳制了日军兵力，减轻了敌后压力。

正是由于这种努力，中国抗战才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与支持。欧美各国先后加大了对中国的援助，如美国派出飞虎队等。这些对中国未来国际地位的确立起到了积极作用。

纵观整个战争进程，尽管在政治利益驱使下，国民党军在战场上不时有些小动作，但在民族大义上还是基本与我党一致的。它始终坚持抗日，即使在最困难时期也没有动摇，并坚持到最终胜利。有关资料显示，八年抗战，国民党正面战场共举行过22次重大战役，歼灭日军100余万，国民党军队伤亡321万。一切与日本侵略者战斗过的官兵，都是值得尊敬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只有借助历史背景来审视桂林保卫战的意义，才能真正做到尊重历史。

（二）在艺术的维度上，要坚持真实的力量

切勿在世俗的影响下屈服，以致堕落成又一部抗日神剧。“抗日神剧”已经成为眼下我国抗日题材影视创作中的一个特有现象。其主要特点为，艺术家完全不顾生活

与历史真实,无节制地使用一些严重脱离现实的情节设计,从而招致观众的反感。例如,手榴弹打飞机、飞镖对机枪等等。

那么,这些神剧是怎样炼成的?是什么逻辑造就了这些神剧呢?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第一,反历史主义。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历史研究,也适用于历史文艺创作。因为远离现实生活就认为可以随意捏造,任意歪曲,这是不严肃的。

就抗日剧而言,我们不是没有过经典案例,《历史的天空》《亮剑》等影视剧作品就赢得了不少口碑,原因就是这些创作基本遵循历史的真实框架,在合理想象的范围内塑造人物和对剧情进行构思,所以对得起历史的评价。而与之相反的是,另一些抗日剧就编得完全不着边际,甚至到了挑战观众智商的地步。例如,一部名叫《孤岛飞鹰》的电视剧,“英雄们”开着越野车,手端冲锋枪,一身黑色皮衣装扮。难怪有网友戏称“抗日英雄高富帅,杀敌如同在打怪”。

缺乏严肃的历史态度,缺乏严肃的创作态度,更重要的是缺乏对历史的尊重,才导致抗日神剧频现荧屏。

第二,娱乐至上的误导。抗日神剧的泛滥成灾,与影视剧生产者片面追求收视率,过度追求轰动效果是分不开的。

随着中国电视产品的市场化,影视剧的创作也日益丰富。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在“市场即娱乐”这样的观念误导下,创作就难免走偏。几乎所有市场类影视剧都追求强情节的节奏,即人物命运要足够跌宕起伏,情节推动要足够一波三折,主角的人气要足够吸引粉丝,这些都对娱乐性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另外一点,作为一种类型剧,抗日剧这些年来也培养了一大批热衷此类型剧的观众。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市场先机。但是,一旦市场娱乐性被强调得过了头,就会出现不少所谓“大投资、超明星”的烂片巨制。如此一来,再豪华的阵容和视觉特效,到最后都会成为一地鸡毛,遭到真正懂艺术观众的鄙视和唾弃。

第三,恶性竞争使然。整个中国影视剧市场的无序竞争,也是导致抗日神剧这一“怪胎”时不时出现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国的电视剧产量不断攀升,每年都能达到共500多部,上万集,影视剧成为一块投资热土。但是,明星的作用被过度放大,使得对剧本的投入少之又少。这就造成了一些影视剧先天不足,剧本生拼硬凑,或是一味迎合市场。抗日神剧也由此出炉。

有关专业数据显示,与其他行业一样,影视产业也遵循着二八原则,即20%赚钱,80%打平或是赔本。因此,大多数影视剧的生产实际上是对人力、财力的巨大浪费。面对如此巨大的生存压力,制片商不得不想一些“三俗”的招数来吸引观众,获取哪怕是短期的效益。

资本法则使得产业内的各方根本无法静下心来安心创作,也根本不去考虑这些剧播出以后可能产生的负面社会效益。一切都以速成为原则,演员快演,编剧快写,完成一部紧接着赶制下一部。如此神速,质量可想而知。创作已不再考虑作品的艺术性和文化价值,更像是进行快餐食品的工业化加工。

黑格尔说得好,“艺术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娱乐、效用或者游戏的勾当,而是要把精神从有限世界的内容和形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要使绝对真理显现和寄托于感性形象,总之,要展现真理”。

(三) 注意细节处理

在一些剧本细节处理上,我们也从专业角度给出了一些建议。例如:

第一,剧本要强化桂林山水的绝美与日本侵略军的残忍,把残酷置于“仙境”,两者形成强烈的对比,以更加有力地控诉日本侵略军的兽行。

第二,一些细节的还原可以大大增强影片的可信度和真实感。例如,枪支装备可以采用那个年代真正使用过的。

第三,根据史料,当时参加桂林保卫战的除了国民党正规军,还有一些地方武装,也就是俗称的“土匪”。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进行艺术生发的“点”。尽管在战前他们做过土匪行当,但在国仇家恨面前,这些人同样义无反顾地拿起武器,抛头颅洒热血,在史册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三、寻访八路军办事处遗址

在桂林市市中心的一角——中山北路14号,静静地伫立着一幢白墙黑顶的小楼。虽然很不起眼,但它却是桂林市一处著名的历史遗存——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旧址。

与前几日考察八百烈士墓给人的血腥、惨烈和悲壮的感觉不一样,这里似乎有着一种难得的平静。毕竟,这里曾经是一个办事机构而不是战场。不过,随着采访调查的深入,我们愈发感到它的历史价值不容低估。

灰色的大门上悬挂着“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牌匾。1963年2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其为广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是国务院1996年11月20日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进大门,大门墙上的“万祥糟坊”四个字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是什么意思呢?和八路军有什么关系?于是,我们向接待的工作人员了解。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里当年曾是一个店铺。店铺主人黄旷达先生曾在此卖酒为生。“糟坊”古语里即酿酒的地方。之所以租用这里作为办公地点,也是为了能更好地掩护自己,避免引起外界注意。

1938年8月至9月间,原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李恕同志接到叶剑英和钱之光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打来的电话,要他在桂林找房子,为建立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做准

备。刘恕随即与党外友好人士熊子民一起物色办公地点。当时,熊先生一家都住在桂林,因此刘恕也就住在了熊家。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他们通过熟人找到了广西银行的黄昌炎经理,再经黄的介绍,才找到位于桂北路138号的这家万祥糟坊。不过,不太巧的是,这里曾遭受过火灾,当时正处于重建之中。店铺主人黄旷达先生表示可以等完工后再搬来。刘恕说,我们急需房子用,可否先住下来再慢慢重建施工。于是,黄先生也便答应了下来,双方签订了租房契约。随后,刘、熊二人开始购置桌椅等家具准备开办办事处。同年11月中旬,时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的李克农带领《新华日报》的部分人员从武汉来到桂林,进驻万祥糟坊,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正式建立,李克农同志担任处长。当时,办事处设有如下机构:警卫室、值班室、办公室、阅览室、行政科、机要科、电台室、秘书室。

在办事处的黑色木板墙上,我们还看到两张照片。一张是1963年徐特立来桂林与店铺主人黄旷达在旧址交谈的照片。徐特立是湖南教育界的老前辈,是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原为十八集团军长沙办事处主任,长沙沦陷后撤至衡阳,不料国民党特务要害死他,于是他经桂林去重庆。在桂林期间,徐特立就住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徐特立到办事处时天已冷,他仍穿着单薄的旧军服,衣袖已破烂。徐特立当年已50多岁了,每天早晨都坚持用冷水洗脸。办事处的同志为了对他表示欢迎,计划到街上的饭馆买些饭菜招待他,徐特立坚持不肯,说是吃点稀饭、咸菜就行了。徐特立好学,有时和龙潜讨论《资本论》,连饭都顾不得吃。他在办事处期间,经常给大家讲政治理论课。另一张是筹建办事处的刘恕和熊子民的照片,如今他们都已离我们而去,但他们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坚毅的革命精神却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

参观完第一层的建筑之后,我们考察团一行上到二楼参观。二楼的休息厅是当年工作人员休息、交流的场所,有时还用于接待相关人员和地下党成员。在休息厅旁边的小屋里,我们还能看到当年用过的两套竹椅以及秘密电台。

小阁楼的一侧是工作人员宿舍。这里摆设相当简单,没有文件柜,也没有写字台,只有几个竹制书架。由此可见,当年的读书氛围还是相当浓厚的。同时,这里也是办事处的临时客房。由于保密的需要,不少人都是天黑才到,或是深夜到访,再找招待所不便,只能暂住这里。当年,不时会有延安和新四军抗日前线的部分干部和进步青年来桂林。办事处在安排这些人员的衣食住行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宿舍一旁是当年的会议厅,办事处大大小小的活动和会议都在这里举行。这里也是李克农处长接待各类人士的主要场所。1939年11月,徐特立还在这里做了题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哲学演讲。

四、其他遗址参观考察

在考察完八百烈士墓和八路军办事处两大遗迹后,我们发现桂林还有几处小的抗

日历史纪念馆,分别是救亡日报社旧址和美国“飞虎队”抗日遗址公园。于是,就在行程的最后两天,我们对这两处进行了考察。

(一)救亡日报社旧址

救亡日报社旧址前楼于1984年10月8日被确认为桂林市文物保护单位。旧址地处桂林市中心区域,周围被各种商业娱乐设施所包围。由于年久失修,原先砖木结构的小楼已成危楼。此前,桂林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就曾多次呼吁,要对救亡日报社旧址进行抢救和维修。因此,桂林市文物管理部门多次与救亡日报社旧址的使用单位进行沟通,以期问题的解决。最后,本着“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桂林市政府决定使用将整个单体建筑的屋面梁架全部拆除重新组装的修缮方法,以此化解保护与使用的矛盾。

据有关史料记载,《救亡日报》创刊于1938年炮火纷飞的上海。当时的上海经过淞沪会战,已沦为日军占领地。创刊后,郭沫若和夏衍曾分别任社长和主编。后来曾一度休刊。1939年1月,《救亡日报》被转移到桂林得以复刊,并接受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领导。社址就在太平路8号一幢简陋平房内。尽管条件艰苦,工作人员依然坚持编辑出版。

在桂林复刊期间,夏衍主编的《救亡日报》以团结文化人士、发动抗日救亡工作为主要任务,成为中国共产党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舆论阵地之一。“皖南事变”后,《救亡日报》于1941年2月停刊。

(二)美国“飞虎队”抗日遗址公园

在广西桂林市临桂县秧塘机场指挥所旧址上有一座抗日遗址公园,这是当年美国“飞虎队”现存的唯一指挥所遗址,见证了飞虎队英勇而传奇的事迹。

抗日遗址公园项目占地250亩,主要建有抗战纪念馆、抗战英雄纪念碑、抗战英雄浮雕墙、空军将士情景雕塑以及营房、指挥所等项目,同时还将兴建高科技航空航天体验区以及开发直升机空中旅游等项目。飞虎队纪念馆将使用更现代化的策展技术,使用图片、视频、文物、模型复制品等多样化的形式,还原飞虎队在桂林的抗日史实。作为遗址公园核心工程的“飞虎队”纪念馆已经落成,即将进入室内装修及文物、资料的摆放阶段。

据桂林市有关史料记载,1942年6月11日,美国陈纳德将军亲自率飞虎队的4架P-40E型和8架P-40B型“战鹰”式战斗机到达桂林,以桂林秧塘机场为前沿基地。1943年12月23日,美国第14航空队前沿指挥部由昆明移防桂林,指挥部和指挥所分别设在秧塘机场两座山的山洞里。从此,美国“飞虎队”桂林前沿基地的一切指令和战报都由这里发出。

桂林市临桂县旅游局介绍说,作为指挥所遗址的岩洞,以前是美国“飞虎队”的整个指挥中心,当时陈纳德将军就在这里坐镇指挥整个战斗。整个公园建设投资在1.6

亿元左右。

不过遗憾的是,在我们考察期间“飞虎队”抗日遗址公园正在建设中,预计2015年3月将对公众开放。

此外,据桂林市有关文物保护单位介绍,近年来,桂林市先后投入近千万元,对一系列抗日遗存进行维护、修缮。这些遗存包括广受社会关注的广西省立艺术馆旧址等,对当年在“西南剧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广西省立艺术馆的旧址,桂林市前后投入几百万元进行维修,使其得以重见天日。

五、抗日遗址的保护与开发的矛盾

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访问时,我们遇到了在此工作近20年的工作人员老江。老江告诉我们,因为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地处桂林闹市区,地段商业价值不菲,所以不少开发商还多次打过在这里建楼的主意。于是,这便启发我们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这样一个商业社会,怎样才能做好抗日遗址的保护与有效利用呢?

为此,我们又走访了桂林文保、文化及旅游等相关部门,结合一些相关媒体报道,终于探听到了一些相关信息。截至目前,桂林市已对三大抗日遗址投入了大量资金,开展了相应的保护工作。

对于历史遗迹与城市开发间的关系,我们查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副馆长、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文丰义有过一段阐释,他的主要观点是,要找到抗战遗址保护与利用之间、保护与城市开发之间的平衡点,政府、开发商、群众等都应该转变观念,不能非此即彼。

文丰义认为,对于抗战遗址,应主张“利用”而不是“开发”,否则很容易走样。当地政府要有控制、有引导,旅游项目要和遗址属性相呼应。“比如一个抗战遗址,周围就不适合建儿童游乐场。”他说。

随着社会各界文物保护意识的增强,对如何化解抗战遗址保护与土地开发、城市建设之间矛盾的问题,各方共识已经越来越多。文丰义认为对那些地处偏远、本身没有建筑物、周边缺乏自然景区的抗战遗址,如战场遗址,“不一定非要保留原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利用,但应该有所标记”。

针对抗战遗址复杂的权属关系,文丰义建议探索遗址使用权的流转方式,保持所有权不变,委托政府或文物部门负责修缮管理;也可以通过立法,规定若使用者保护不力,则政府可以采取强制措施。

一些地区的文物本身看起来好像还比较良好,但周边环境破坏严重,经常被随意改造,如修建广场以方便举办仪式性活动等。这样的改造往往使得文物看上去十分突兀,与周边极端不协调。“这其实也是对文物的一种破坏,文物脱离原有环境,便不具有历史价值。”文丰义指出。因此,他建议,城市中留存的抗战遗址,应在城市规划建

设中以合理的方式保留,让抗战遗址成为城市的地标和精神象征。

作为一种对比研究,我们还对当年作为抗战重镇的重庆在抗战遗址保护方面的思路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不少收获。

据相关资料介绍,重庆市共有抗战遗址 767 处。其中,现存 395 处,占 51.5%;消失 372 处,占 48.5%。重庆是全国保存抗战遗址数量最多的城市,现存的抗战遗址主要集中在“一岛”(渝中半岛)、“三山”(歌乐山、南山、缙云山)、“三坝”(沙坪坝、江津白沙坝、北碚夏坝)。对此,一些专家认为,为了实现文物保护与城市发展相协调,可以考虑让抗战遗址资源丰富的区县根据各自特点来打造自己的特色。对抗战遗址的保护和利用还应增加技术含量,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比如绘制抗战遗址数字化地图,将全市抗战遗址资源存入数据库,对一些消失的抗战遗址绘制三维数字虚拟图等。

六、有效发挥抗日遗址的历史教育意义

近几年来,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中日关系跌入低谷。日本方面(主要是右翼组织)一再歪曲历史,否认侵略,在国际上制造某种美化侵略的舆论。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课题,那就是,如何尽一切可能,利用一切现有历史资料(包括文献和建筑)向广大的世人,尤其是年青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争取在这场话语权的争夺当中取得主动与胜利。

当然,面对这样一个宏伟的目标,全中国人都会行动起来。那么,桂林又是如何发挥地域和文化优势,加入到这场全国性的教育行动中的呢?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又进一步进行了调研和考察。

在八路军办事处旧址,我们看到墙上挂着 20 多块牌匾,内容多涉及各单位与旧址之间的合作,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青少年社会实践基地”等等。那么,这方面的实际效用发挥得如何呢?

我们首先以外地大学团委的名义进行了采访,问可否派学生假期里到这里集体实习外加学习参观。工作人员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向我们就有关对接细节做了介绍,这让我们颇为感动。

接着,我们表明了来意,希望了解一些相关数据。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和桂林 40 多家大、中、小学为共建单位,每年吸引 10 余万人次的青少年前来参观。

经过多年的运营与摸索,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在面向青少年进行红色教育方面已经颇有心得。据负责讲解的有关人士介绍,他们主要抓了以下四点:

第一,根据不同的需求配备不同的讲解词,语言表达方式要显示独特性、个性化。很多红色旅游景点都只有一套讲解词,而且讲解语言都是针对成年人的,未成年人对其中的很多关键词其实在理解上是有困难的。如果语言理解有障碍,爱国主义教育信

息的传达也一定会打折扣。因此,对解说语言的基本要求就是一定要做到简单、形象。在面向未成年人进行解说时,讲解过程要更加接地气,更多地结合未成年人的年龄认知水平,以实现讲解效果最佳化。

第二,内部展览资料同样也要考虑未成年人的需要。全国的纪念馆几乎说的都是“大人的事”,这也给未成年人的参观理解造成障碍。要解决此类问题,就要求景点内部一定要有一定比例的、适合未成年人理解、接受的展览资料。例如,可以使用更多的动画元素,或者是把历史故事改编成漫画等形式加以表现,这样更加能够引起未成年人注意。

第三,展馆还要举办一些馆外活动。在面向未成年人这一点上,要更多地把展览办到校园中去,更多地在校园内开展志愿讲解活动,让未成年人自觉地担负起传播文化的社会责任,让传播爱国主义成为一种自觉行为。同时,通过举办这样的活动,还能培养志愿精神,可谓一举两得。

第四,可以考虑在景区之外进一步延展有关活动。例如,可以举行一些模拟演出的活动,以此用更形象的方式展示历史,进一步把历史展示与文艺创意有机结合起来。这一点也是借鉴了一些旅游景点利用实景演出宣传旅游资源的做法。

除了讲解以外,还有一种有效的历史传播手段——口述历史,这也是十分重要的。

口述历史,是一种重要的历史资料收集形式。根据有关定义,口述历史就是“由历史学家、学者、记者、学生等,访问曾在现场的见证人,让学者文字笔录、有声录音、影像录影等。在之后的学术分析中,在这些原始记录中抽取有关的史料,再与其他历史文献比对,让历史更加全面补充、更加接近具体的历史事件真实。”

与传统的图片、文字、物件、模型这些形式相比,口述历史显得更加鲜活生动。因此,它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与欢迎。近来,不少口述历史博物馆陆续在我国出现。

2013年,我国第一家口述历史博物馆在中国传媒大学正式开馆,这就是由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崔永元创办的口述历史博物馆。这是我国口述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自2002年开始,崔永元和他的团队开始大量收集口述历史资料。关于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崔永元是这样回应的,他说,中国对口述历史的重视是相当不够的。他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考察口述历史,结果让他感慨万千,因为全中国所有的口述历史资料加起来还不如一家大学多。崔永元说道:“现在大家越来越淡忘历史——我们有过什么样的胜利,什么样的失败,什么样的灾难,什么样的痛苦,该就哪些方面的事情反思……这些问题统统都被边缘化了。现在一些年轻人,别说不能讲明白抗日战争的历史,就连‘四人帮’是哪四个人都说不清楚,这样下去挺危险的!”

除口述历史博物馆外,一系列的口述历史类电视节目也陆续出现。自2002年起,崔永元和他的团队耗资1.3亿元,共做了3500个人的“口述”,搜集了共计10万个小

时的影像资料,已先后推出了《电影传奇》《我的长征》《我的抗日》等系列专题纪录片。

然而,在目前桂林的各个纪念馆,我们很遗憾地没有看到口述历史的资料。口述历史是一件很迫切的事,某种程度上是与时间赛跑。因为随着时光的流逝,历史亲历者只会越来越少。

七、利用传播的力量推广抗日文化资源

在参观、考察桂林抗日遗址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即有的管理者对抗日遗址等历史文化资源进行管理时,思维还停留在传统的行政化时代,认为只要把地方管好,定时修缮维护即可。对于参观的需求,基本上也是持“坐等上门”的心态。固然,作为非营利的公益项目,这种做法并无不妥,但是如果不能最大限度地让公众知晓这些遗址的应有价值,则实际上也是一种浪费。

鉴于此,我们结合我们的传播专业知识,站在传媒加旅游跨界营销的角度,给上述遗址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要点如下:

(一) 充分利用新媒体,加强互联网思维

目前,互联网思维已经极大程度地席卷了各个行业,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与行事方式。随着各种移动数据终端的出现,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在掌心之间寻找想要的信息。于是,各种微信平台成为各个商家展示自身形象和寻求目标群体关注的重要工具。这方面成功的例子可以说不在少数。

例如,上饶市广丰县嵩峰乡率先用微信的方式为其本地旅游做宣传。它依托当地的六石岩景区出了上联“出双山望六石六石磊磊”,然后在微信上悬赏,如果谁能对出下联,就能得到奖金奖励。效果还不赖,关注度一下就上去了。该乡经常通过微信发送上饶好山好水好风光的图片,为上饶旅游做宣传。

再如,河南省旅游局官方微博除了发布诸如“吃住行游购娱”等方面的基本信息以外,还经常开展各式各样充满创意的暖心活动。例如,该旅游局曾举办一场名为“心灵故乡,老家河南”的推广活动,即以老家的形象、故乡的性情、睿智的语言,展示河南的旅游文化风貌。此外,该旅游局还巧借电影《泰囧》的流行元素,结合流行话题发起了“2013 河南旅游愿望清单”的活动,引发网友的大量关注与转发。之后,河南省旅游局按照每个人所提出的经典愿望,并结合每一位网友的旅行方式和自身影响力,经过反复的商议和讨论,从众多的网友中甄选出六名特色不一的幸运儿。

上述这些案例,对于抗日遗址的推广应该说是很有借鉴意义的。例如,在纪念馆门口可以在显著位置把机构的微信二维码标出来。在宣传单页上也同样可以添加这些信息,以方便公众关注。

（二）利用微电影，做形象化的历史传播

微电影，是一种全新的影像传播形式。从营销角度来看，微电影能够给观众带来一些潜移默化的东西，像电影一样有故事情节，能够让观众喜爱，这是采用微电影营销的主要原因。“微电影营销”指的是企业将各种视频短片以各种形式放到互联网上，达到一定宣传目的的营销手段。可以说，微电影营销，是将电影广告与互联网营销两者结合在一起的，它有着电影和广告的双重效果。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微电影营销队伍也将会越来越壮大。

微电影营销不只用于商业领域，红色教育领域同样可以使用这一新手段做形象化的历史传播。例如，一部以“红军留款信”历史故事为题材的微电影《风展红旗》，就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1929年8月20日，朱德率红四军途经杨美村休整。由于饱受国民党军欺压，村民谈兵色变，村中不见一个人影。为了购买粮食，红军战士跑遍全村，仅找到身残体弱老汉苏观泗。经过一番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苏观泗打消了顾虑，带着红军战士到堂弟苏和家找到了大米。红军战士从米缸里称了29斤米，将购米款大洋二元交给苏观泗。临行前，红军还在墙上用毛笔留言。一周后，朱德率红四军回师漳平，再过杨美村，全村百姓兴高采烈，拿出家中最好的食物慰劳子弟兵。次日，红军发动溪南突袭战，取得大捷。该片讲述的就是这一段红军军纪严明、秋毫无犯的感人故事。

此留款信题于漳平市象湖镇杨美村的苏和厝，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全国唯一保留完好的红军题壁留款信。经过精心修缮，苏和厝已成为“朱德率红四军突击闽中纪念馆”。该纪念馆已成为龙岩市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基地，也是漳平市革命传统教育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基地。微电影《风展红旗》不仅再现了红四军突击闽中艰苦转战的情景，而且真实反映了当年红军良好的行为准则和优良传统，同时，也给漳平市红色旅游的宣传推介注入了新的元素。

由此可见，桂林的历史故事中，除了前述八百烈士这样的宏大体裁适合做成电视剧以外，可以改编成为微电影的素材还是不少的。例如，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当时所处的秘密战线相关的活动，就很适合做成谍战性质的微电影。

八、总结

几天在桂林的考察，给我们带来不少有益的体验与思考。感谢校工会的组织，使我们有了这样一个难得的了解历史、缅怀先烈的机会。更令人欣慰的是，这个过程对我们而言，不仅是一个吸取的过程，也是一个给予的过程，因为我们利用自己的专业与知识，给了包括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在内的诸多桂林抗日遗址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相信应该会取得不错的社会效应。